

澳大利亚教育译丛 杨婷匀 主编

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

—— 1960年以来的政府、经济与公民

Educating Australia

西蒙·马金森 著

沈雅雯 周心红 蒋欣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澳大利亚教育译丛 杨婷匀 主编

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

—— 1960年以来的政府、经济与公民

Educating Australia

西蒙·马金森 著

沈雅雯 周心红 蒋欣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1960年以来的政府、经济与公民 / (澳)马金森著；沈雅雯，周心红，蒋欣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1

(澳大利亚教育译丛 / 杨婷匀主编)

ISBN 978-7-308-05565-9

I. 澳… II. ①马… ②沈… ③周… III. 教育史—澳大利亚—1960～ IV. G561.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8625 号

Educating Australia

Copyright© Simon Marginson 1997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06—66 号

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1960年以来的政府、经济与公民
西蒙·马金森 著 沈雅雯 周心红 蒋欣 译

责任编辑 陈晓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28)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341千字

版 印 次 2007年11月第1版 2007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5565-9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072522

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

——1960年以来的政府、经济与公民

西 蒙·马金森 著
沈雅雯 周心红 蒋 欣 译

献给我的父母、贝蒂和雷·马金森。
这也是他们的故事。

中文版序

中国近年来的教育增长得非常快。其扩张的速度、质量的改进和国际化进程令人瞩目。例如,在1998年至2004年间,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增长了四倍。当前对物资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投入将把中国的研究型大学提升到科学生产的第一流行列中去,而且能使这些学校对外国学生越来越有吸引力。同时,职业教育也在快速地发展和现代化。而在中小学这一级别上,在全国范围内仍在开展扫盲行动,因此在提高和扩大各类教育专业人士队伍方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专业人士包括教师、学术研究人员、各类管理人员、机构与系统的领导人和管理者。

中国当前在教育、技能、学术和研究方面的发展是史无前例的:无论是在发展的规模上、在其非同寻常的速度上还是在推进数量的同时也提高质量的决心上,都是如此。对教育的投入主要由国家和各省政府牵头,但部分也由家庭和学生个人提供,有时也由产业界提供。其长期含义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即使教育和研究还正在得到提升和现代化,它们本身同时也正在成为中国所有其他部门现代化和进步的首要载体。教育和研究在产业、社会和政治变革中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大多数国家经历过——或正在经历——一种类似的在教育中和通过教育加速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也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白领”职业的增加和一个日益扩大的中产阶级想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生活的越来越强烈的愿望相关。在许多国家里,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化也与政策制定者、社会改革者以及教师要创建一个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社会的愿望相关;在这样的社会里,教育提供了更多的平等机会。

《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一书讲述的是,一个把教育置于国家政策、期望和身份中尤为重要的位置上的国家,是如何着手使自己的教育体系现代化而同时又试图创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和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的。

自从1788年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澳大利亚于1901年获得了国家独立,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它才开始发展自己独立的高质量的教育体系。正是由于澳大利亚经济在50年代的长期高速发展,以及一个更加独立的国家身份的鼓舞,才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这与中国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经历十分相似。在澳大利亚,教育在

1960年后才真正起飞,尤其是在公立学校和大学领域内,而这极大地有依赖于中央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大学中,一个一流的研究体系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建立起来了。在同一时期里,学生人数增长了六倍,而研究生这一级别增长得更快。中央政府的教育开支在到1975年为止的六年时间里增加了四倍。开始的时候没有足够的受过训练的教师和研究人員,但最后,随着对培训设施的大力投资,这些短缺现象都得到了克服。一种强大的教育研究文化发展起来了,澳大利亚成了一个英国、美国和西欧国家的教师都想来工作的地方;一个快速增长而且需要他们的才干和贡献的教育体系伸开双臂欢迎他们的到来。

但是,构成澳大利亚教育扩张的基础的那些不同的期望——一个更具竞争性的经济和一个更为平等的社会——并不总是协调的。尤其是,教育最初的扩张和提高是由国家投入牵头的,这就使得政策制定者能够确保建立一种既是高质量的同时又更为平等的教育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在由市场决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之下,国家投入的持续增长被认为过于铺张。在优先项目的安排和投入方式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政府选择继续发展教育,并使其更为包容和全球化;与此同时,对公共投入开支(尤其是在大学这一级)加以限制,培育私立教育机构(尤其是在中小学这一级),并使所有学校更具竞争力,在运行时更加企业化。其结果是在教育的扩张和现代化方面获得了某些成功,但也出现了公平性和质量降低的压力,社会和产业界对教育机构的不满也加大了。

在此期间,逐渐形成了一种更为狭窄的政策观念,这种观念的基础是把学生看成未来的“经济公民”,而把教育看成一种拥有在市场上可以买卖的可销售产品的独立的经济体。这些观念与有时十分可观的效率上的改进相关——这当然对政府很有吸引力,但也有消极的后果,例如把教育利益限制在经济利益范围内,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学校、学院和大学对文盲的扫除、文化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建设和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所作的贡献。另一个负面后果是教师和大学教授的职业权威有所削弱,他们发现自己会受到教育管理人员的事后批评,而管理人员有时候能够、但并不总是能够理解专业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问题。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教育举棋不定、充满困扰。如今,在21世纪最初十年的后半段,很明显,这种举棋不定的局面在加深,我们需要的是一项新的全国性政策。

《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在这个时候被译成中文,因为我所尊敬的中国学者告诉我说澳大利亚教育的这段经历,既包括它的许多成就也包括它的失败和迷惑,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首先,有值得记取的教训。所有国家都有其独特性,但也有不少共同之处,因此比较教育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用的。而且,各国(尤其是同处亚太地区的各国)现在

面临的是一个共同的国际环境,我们必须更多地相互了解。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各自的教育体系,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从很多方面来说,构筑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正是教育和研究。

第二,教育的扩张和现代化是由某些重要思想所激发的,这些思想包括人力资本投资观念、教育对社会公平作出贡献的观念、为了培养公民而进行教育的观念、作为人的权利的教育观念、教育作为市场商品还是作为公共产品的观念、教育作为建设民主的载体的观念。这些思想并非仅仅是抽象的东西,它们经常左右着我们办教育的方式。反过来,这些重要思想,以及怎样实行这些思想的方式,常常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们有可能做到什么,因此也决定了他们所共有的整个社会有可能做到什么。《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的主要贡献或许是它追溯了这些重要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推行过程,以及这些思想之间的协调和冲突的方式在澳大利亚的表现过程。与此同时,本书还在有关现代化的学术分析中增添了一个基本的方面,因为对现代化的学术性分析往往会贬低或忽略教育体系所起到的很重要的形成性功能。在中国,这些重要的教育思想之间的平衡与澳大利亚的情况有所不同,但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与在澳大利亚一样明显。

我真诚地希望本书对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工作和学习的学生、教师、大学领导人和政府行政人员有一定的学术上的益处,或者是实际的价值。尤其是,我希望它能有助于人们对中国教育的批判性思考。历史赋予了我们一个极佳的机会来对当前的实践进行反思并思考未来的可能性,但我们还必须以一种积极思维和开放式思维的方式对历史开展研究——它使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有关我们自身的新东西,而不仅仅是把我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告诉我们,或者(更糟糕)只把那些我们想要听到的东西告诉我们!

我欢迎大家就本书中的问题来信并展开讨论。本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在另三本书中有所充实,那三本书也已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或即将出版:

●《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西蒙·马金森),该书是一本讨论与教育扩张相关的政府政策问题的更为实用的书。

●《澳大利亚企业型大学的权力结构、管理模式与再创造方式》(西蒙·马金森和马克·康西丹),该书是对澳大利亚大学体系改革的一个广泛的实证性研究,大学体系的改革导致了一种新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诞生,即“企业型大学”。

●《教育市场论》(西蒙·马金森),该书是这些书中最基本的一本。它对教育市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

我要真诚地感谢协助本书在中国翻译、出版工作的一些人士。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在其博士生导师徐辉教授指导下工作的 Sally Chiao (杨婷匀)。我还要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

最后,我祝愿所有的中国读者在未来的岁月里在建设世界级教育和研究机构的过程中好运!

西蒙·马金森(教授)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墨尔本大学,澳大利亚

2007年2月

表 格

除非另有说明,所有数据均指澳大利亚。

- 1.1 澳大利亚 1960 年和 1995 年各级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总数
- 1.2 1911~1991 年教育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澳大利亚人口统计数据
- 2.1 澳大利亚 1955、1965、1975 年的教育、人口和劳动力增长指数
- 2.2 1947~1975 年澳大利亚各级教育中的学生注册入学人数
- 2.3 1947、1961、1975 年 15~19 岁学生参加全日制教育的人数比例
- 2.4 1989~1991 年公立学校的学生入学比例
- 2.5 1948 年维多利亚州入学班级
- 2.6 1950/51 年度到 1975/76 年度澳大利亚教育投入
- 2.7 1948/49 年度到 1975/76 年度澳大利亚个人投入在教育总开支中的比例
- 2.8 1939、1951、1961、1971 年大学收入来源
- 2.9 1969/70 年度、1972/73 年度和 1975/76 年度联邦政府分类教育投入,1984/85 年度不变价格
- 2.10 1950/51 年度到 1975/76 年度联邦政府在教育投入中日益重要的作用
- 2.11 教育项目中的全日制联邦雇员,1967~1976
- 3.1 1968/69 年度到 1972/73 年度联邦政府对私立学校的拨款,1984/85 年度不变价格
- 3.2 卡梅尔报告中联邦政府在两年中对学校的追加拨款,1974/75 年度不变价格
- 3.3 1975/76 年度至 1982/83 年度联邦对私立学校的投入,1984/85 年度不变价格
- 4.1 1971~1977 年澳大利亚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要经济指标
- 4.2 1976~1983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商品和服务出口上的变化
- 4.3 1970~1990 年澳大利亚和经合组织国家政府开支与收入所占 GDP 的比例
- 4.4 1967 年、1979 年和 1987 年社会支出和减税之间的选择
- 4.5 1975/76 年度至 1995/96 年度联邦预算支出,1984/85 年度不变价格
- 4.6 1975/76 年度至 1987/88 年度与 PAYE 税收相比的联邦社会支出,以三年为间隔,1975/76 年度不变价格
- 4.7 1987/88 年度至 1990/91 年度联邦预算盈余
- 7.1 1975/76 年度,1982/83 年度至 1992/93 年度联邦政府财政支出在教育各部门的教育经费中所占份额

- 7.2 联邦政府在义务教育阶段后教育和培训、劳动力市场以及对学生和失业人员补助金项目上的资金投入,1975/76 年度,1982/83 年度和 1991/92 年度,以 1984~1985 年间的物价水平为参照
- 7.3 1975~1990 年间澳大利亚各产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的发展
- 7.4 1983~1994 年间高等教育各研究领域的招生规模
- 8.1 1982~1995 年 11 年级和 12 年级学生的入学情况
- 8.2 1969 年和 1975~1995 年间中学 12 年级的表面巩固率
- 8.3 1975~1996 年在高等教育中就学的学生
- 8.4 1987~1995 年按课程水平划分的高等教育学生人数
- 8.5 1979~1996 年高等教育学生中女生的比例
- 8.6 1975 年、1982 年和 1992 年 15~19 岁青少年的教育参与度
- 8.7 1975~1995 年不同阶段接受教育的学生
- 8.8 战后澳大利亚的两次教育扩张浪潮:60 年代至 70 年中期,和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期
- 8.9 1984、1988、1990、1994 年计划接受高等教育的 15~17 岁年龄段的学生比例
- 9.1 1975/76 年度至 1992/93 年度公共资金和私有资金(按来源)对教育的投入
- 9.2 1975/76 年度至 1992/93 年度(按部门)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 9.3 1975/76 年度至 1995/96 年度联邦政府的教育支出(按部门)
- 9.4 1982/83 年度至 1995/96 年度联邦政府对各州、区的一般收入拨款(1984/85 年度不变价格)
- 9.5 1975~1995 年政府学校教师人数
- 9.6 1975/76 年度到 1995/96 年度联邦对高等教育的投资,1984/85 年度不变价格
- 9.7 1975~1996 年高等教育学生人数
- 9.8 1975/76 年度到 1992/93 年度政府最终消费性支出与学生人数的比较
- 9.9 1975~1992 年高等教育学生与教师的平均比率
- 9.10 1975/76 年度,1982/83 年度和 1992/93 年度政府对教育基础工程的分部门投入
- 9.11 1975/76 年度到 1992/93 年度私人渠道教育经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以 1984/85 年度价格计算
- 9.12 1987~1995 年高校全额自费留学生人数
- 9.13 1983、1990~1994 年政府及非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
- 9.14 1983~1995 年不同学校学生人数分布情况
- 9.15 更受人欢迎的学校类型,1994 年全国民意调查

注意:表格中“…或…”的记号意为数据不可得,nei 意为别处未包括。

缩略词

ABC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ABS	澳大利亚统计局
ACER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
ACES	澳大利亚教育标准委员会
ACTU	澳大利亚工会联合会
AEC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AEU	澳大利亚教育联合会
AFR	澳大利亚财务评估委员会
AGPS	澳大利亚政府出版社
ALP	澳大利亚工党
ANOP	澳大利亚全国民意测验
ANTA	澳大利亚全国培训局
AVCC	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
BCA	澳大利亚商会
CA	澳大利亚联邦
CAE	高等教育学院
CAPA	澳大利亚研究生协会
CBCS	联邦人口与统计局
CBP	联邦预算文件
CEDA	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委员会
COAG	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
CSC	联邦学校委员会
CSIRO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CT	堪培拉时报
CTEC	联邦高等教育委员会
DE	教育部
DEET	就业、教育与培训部
DEETYA	就业、培训、教育与青年事务部
DITC	工业、技术与商务部

ELICOS	海外学生英语语言强化课程
EPAC	经济计划咨询委员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GNP	国民生产总值
JSCM	移民问题联合执行委员会
LNP	自由与国家党
MCEETYA	就业、教育、培训与青年事务部长委员会
MOVEET	职业教育、就业与培训部长
NCVER	全国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NSW	新南威尔士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SC	学校委员会
StC	导航委员会
SMH	悉尼晨报
TAFE	技术与继续教育
TNC	跨国合作
UK	英国
UNESCO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SA	美国
VG	维多利亚政府

序

《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的第2章至第9章的初稿完成于1996年3月,那是在霍华德联合政府的当选预示着从不平静的教育政策领域里又将激起涟漪后的一个周末。这几章的内容在1996年晚些时候又作了修订,当时自由—国家党的教育及其他事宜的议事日程——在有些方面有新意,在其他方面还是老面孔——正在成形。然而,书的写作所花的时间要长得多。《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是一个更大规模的关于“教育市场”的博士项目的第一项成果,我从1988年到1996年一直在忙于这个项目。《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是作为一本独立的书来写作的,是战后澳大利亚政府和教育的历史,在这一时期里,人们试图为在过去的十年中教育市场的出现做好准备。第9章给出了那个更大规模的项目的轮廓(Marginson 1997d)。与那项研究相比,《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对理论关注得较少,而更多关注的是历史,是讲述教育、政府、经济和公民的历史。

叙述性文体的优势是它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变化上,吸引到了所有现象的历史相关性上。对于叙述性历史学家来说,时间就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在这河流中的一切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一切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其缺点是某些潮流(“历史法则”)太容易被看成相对所有其他进程而言处于决定性的和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叙述性文本中,因为有系列事件、开头和结尾,而美是以流动的顺畅性来衡量的,历史的不可避免性就会在文本的节奏中几乎是自然地出现。在开头的地方,我抵御住了单一性解释和我们命运的不可避免性的诱惑,想要强调现实的丰富和复杂,以及各类事件的偶发性和可变性。在这里,所描述的政府、教育 and 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有可能是不同的。不能说“一切皆有可能”,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由我们从过去所继承来的那些东西所决定的,我们也要受到我们能力和资源的局限性的限制;但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中存在着许多的可能性和选择;虽然有时候会多一些,而有时候会少一些。

本书是30多年来澳大利亚教育的历史,其重点集中在政府和政治方面。要为谈论这一社会层面的历史寻找正当理由是容易的,因为在1960年以来的这段时期里,教育一直在政府计划、国家身份和几乎每一个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但它尚未得到历史学家应有的关注。在这段历史中,书名涉及的每一个术语——“澳大利亚”、“政府”、“经济”和“公民”——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所有这些术语都是可以商榷的,要经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而且会受到一系列范围很广的影响。在

《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中,教育、政府和政治被置于经济和社会变化、知识和思想,尤其是关于政府的思想的变化,以及各种个人主义思想之畔。这是一个力量/知识/经济分析,在下面这些系列的丰产的交叉点发挥着作用:部分的经济历史,部分的政治历史,部分的对力量—知识以及教育中的政策宣讲的影响的叙述。它与《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1993)的某些主题有交叉,但处理方法不同。那本书是对教育中的经济政策的批评,而《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打算探讨那些政策的历史根源,以及它们的构建特点,这是跨越它们和它们所强加的限制的前提条件之一。“既然这些事情已经被做成,它们也可以被取消,只要我们知道它们是怎么被做成的”(Foucault 1988: 37)。

尽管有些人抱有这样的希望(比如 Harris 1994),我没有找到什么我们或许可以利用来在一个毁灭和更新的美妙时刻推翻这一历史的阿基米得式的观点。相反,《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有一系列的题材、反复出现的主题和次要情节:强有力但不完整的教育的经济化;通过教育的现代化和公民权的延伸,以及变化中的公民权的特征;自由政府的日趋成熟;竞争的积累性效应;从全民公共教育供应到市场体系的转变,以及它们的“参与”和“平等”的新的意义。这些反复出现的主题之一公民权被用在了本书的结构安排中。正如本书的计划还表明的那样,1975年的全球性政治—经济危机和从凯恩斯主义到市场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转折被看成一个决定性时刻,它所造成的后果还在不断地展现出来。那是有可能不同的一套决策。

关于本书中所采用的方法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政府”这一术语指的是国家政府和国家政体内及围绕着国家政体所包含的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领域,而不是福克尔特式的“政府”和“政府性”,后者把主权和纪录的实践与对其自身的管理混为一谈。这些意义对读者来说较难理解。同样,伊安·亨特(Ian Hunter, 1994)对教育历史的福克尔特—韦伯式解读的含义会在别处进行评论(Marginson 1997a)。与亨特(在他看来,政府是把国家的秩序和繁荣本身当作目标并受此推动的专家领域,而且不能降低为民主的认可)形成对照的是,在《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中,“政府”包括政治辩论和争执,并受到对社会利益的追逐的影响。它受制于来自“上面的”像全球化公司这样强有力的行动者的决定,还受制于来自“下面的”突发事件,以及较为缓慢的民主压力的积累。然而,本书也部分地建立在来自福克尔特和福克尔特后的关于政府性的著作的真知灼见的基础之上(例如, Burchell et al 1991; Miller & Rose 1990; Rose & Miller 1992; Rose 1990, 1993; Meredyth & Tyler 1993)。自由政府既通过“公共”机构也通过“私人”机构运作;而自由个人是在教育中和别的地方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个体而形成的,他的自由采取的是有节制的自治的形式。就这样,我们在经济消费和社会规则上受到管制。其含义在别的地方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Marginson 1997c; 1997d)。

第二,本书的前提建立在受后凯恩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教育竞争和市场的政治经济的基础之上(Marginson 1995b; 1996a)。按照弗雷德·赫奇(Fred Hirsch)(1976)的说法,教育是一种受制于学生和家庭之间的“地位竞争”的“地位性商品”,而不是像比如说布尔迪奥(Bourdieu)所说的那种“文化资本”。地位性商品就是教育的席位,这些席位被认为向学生提供了在对收入和社会一职业地位的社会竞争中的相对优势。教育中的某些席位比其他席位具有更大的“地位性价值”,比如说医学课程中的席位。文化资本和地位性商品指的都是在教育中所获得的象征性特征。之所以使用地位性商品这一名称是因为它把一个人的教育与另一个人的教育联系起来,从而突出显示了教育在社会选拔中的功能。还有一个理由。与布尔迪奥的法国相比,澳大利亚没有那么稳定的阶级文化,而且或许对竞争的现代化形式持更加开放的态度,在现代化形式的竞争中,世袭的文化特征更多地从属于地位而不是相反。

在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里,不同的主题是从宏观而不是从微观的角度来探讨的,并把它与教育体制的设计、资金投入和管理等联系起来。还需另写一本书,并进行一项实证研究,将公民权的不同实践与教育技术和教育机构的微观组织交叉起来。本书并不打算成为一部明确的1960年以来的澳大利亚教育史。它是对“我们为什么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这一问题的宏大而永远无法完全定夺的解释所作的众多贡献中的一个。所以,虽然1960年后的澳大利亚历史和澳大利亚教育需要更大的关注,但其中有些部分已经在别的地方详细描述过,我也没有打算重复这一工作。比尔·康奈尔(Bill Connell)的《重塑澳大利亚教育》(1993)讨论的是中学课程设置的评估方法的发展;另外可参阅丹尼斯·梅利迪斯(Denise Meredyth, 1993)和比尔·汉南(Bill Hannan, 1985)的更早的著作。与性别相关的文献也很多,比如林·耶茨(Lyn Yates, 1993),还有米利安姆·亨利(Miriam Henry)和桑德拉·泰勒(Sandra Taylor, 1993)。理查德·提斯(Richard Teese, 1981, 1984, 1989)和唐·安德森(例如1992)则审视了非公立与公立办学。我在其他著作中进一步探讨了教育与劳动市场的关系(Marginson 1993b, 1995a)。那些认为应该有更多关于教育市场的论述的人是正确的。市场的形成在本书第三编第9章中作了简短的审视,但在其他文献(Marginson 1995b, 1996a, 1996b, 1997d),以及肯威(1993)和其他人的文献中有更深入的论述。

著述本书是一种快乐,是一种足以对得起在教育政策方面半辈子的耕耘的愉快的劳动。这是一种在经济上没有什么意义的劳动,一种管理教科书永远也无法理解的劳动。当最后的几章开始形成的时候,耳听着空中飘荡着的《勃兰登堡协奏曲》和《格尔德堡变奏曲》,我常有兴高采烈之感。我很感激自己有机会做这项工作。然而,《现代澳大利亚教育史》也依赖于除了作者之外的其他人。首先是梅尔芭,自从我们1988年结婚以来她所创造的温馨和幸福,这种幸福是某种创造性所需要的条件。还

有我们的女儿安娜·罗莎,在我们即将完成本书时她也加入了进来,她甚至比写书更加出色。

第二,除了我在《澳大利亚教育与公共政策》的序中所感谢的那些人之外,有几位人士在这本书的写作中起到了直接的作用。斯图亚特·麦辛泰尔(Stuart Macintyre)在历史的写作方面教给我许多东西,我以前从未写过历史,他的示范和支持对本项目是十分有益的。罗杰·沃克(Roger Woock)是一位很支持我们的、很有思想的博士生导师。菲利普·麦根尼斯(Phillipa McGuinness)是一位模范的、很能激励人的出版商,最后作品的问世在很多地方要感谢她。安妮·冯德莱(Anne Findlay)向我们提供了明智的版本编辑意见。彼得·贝尔哈兹(Peter Beilharz)具有在对某部作品进行批判性思考的同时进入其精髓的能力,我发现他的评论非常有价值。罗伯·帕斯科(Rob Pascoe)阅读并改进了大多数章节。泰利·塞东(Terri Seddon)、理查德·提斯、托比·波吉斯特(Toby Borgeest)和格雷汉姆·麦卡洛奇(Grahame McCulloch)也对文稿和其他相关材料提出了意见。我还想感谢珍妮·李(Jenny Lee)、广礼道(Kwong Lee Dow)、菲泽尔·利兹维(Fazal Rizvi)、戴维纳·伍兹(Davina Woods)、谢伦·巴洛(Sharan Burrow)、罗伊·马丁(Roy Martin)、吉姆·威廉森(Jim Williamson)、朱丽·威尔斯(Julie Wells)、苏西·帕斯科(Susie Pascoe)、卢克·斯莱特立(Luke Slattery)、伊丽莎白·安德森(Elisabeth Anderson)和匿名的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校读者。